

前几天,浙江大学为了庆祝其120周年校庆,贴出一篇公告。有话不好好说,偏要写成四六骈文。结果这一显摆不要紧,该文因为文词粗陋,立刻让网友们掀起了一场“大家来找茬”运动,对该作的批驳文章篇篇都能从中挑出数十个错,集批判性、趣味性、知识性、可读性于一体,比那词不达意的骈文本身好看多了。浙大这次面子可真算跌大了。

窃以为,浙大这篇校庆公告之所以被喷成狗,执笔者技不如人倒在其次,关键是他对四六骈文这种文体的“封建阶级反动本质”还是认识不足。骈文是什么东西?那是一种文字奢侈品,而奢侈品这玩意儿是具有“无限可比性”的——你拎着真皮包穷显摆,人家就有爱马仕、路易威登,等你卖肾买了路易威登,人家又买上限量款,即便同是限量款,也可以分好几个档次,商家搞这么复杂,就是为了避免出现闺蜜们用拎包互撕时出现难分高下的情况。骈文其实也是一个道理,若问:骈文中为什么要有那么多对仗、押韵,用典的讲究?则答:没这些玩意儿,怎么满足广大青们互喷的需要?所以,写骈文就要做好被喷的准备,即便你是庾兰成转世、王子安复生,也甭想靠一篇雄文震得大家纳头便拜,文人就这德行,何况眼下还是网络时代。

说起来,在古今中外的各类问题中,骈文确实堪称转文中的战斗机,咱中国人只靠这一种文体就能坐上“世界最会转文民族”的宝座。外国人虽然也转文,但跟咱比起来太小儿科:欧洲人的转文方式是在信的开头和结尾加一堆无比拗口的超复杂主从句,且语意翻译过来都特肉麻,什么“请您原谅我斗胆将这几张破纸呈现在您面前”,“您应该相信我

今年刚过一半,国内文艺界已经送走了不少名人:陈忠实、梅葆玖、杨绛……他们的离去,自然是文艺界的一大损失。但是在铺天盖地的缅怀哀悼中,也出现了一种令人困惑的现象:不论是圈内人还是圈外人,对于逝者都不吝溢美之词。比如,有人称杨绛为最后一位大师,标志着民国时代的落幕。这种描述令人耳熟,一翻过往的报道可知,巴金、季羡林、南怀瑾、钱穆等人,头上皆有一顶“最后一位民国大师”的帽子。

戴高帽在中国文化圈并不是稀罕事儿,也不局限于刚过世的名人。在一些已故作家的作品座谈会上,也常常充斥着并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赞誉。如近日召开的汪曾祺小说研讨会,有评论者便将汪曾祺抬高到与曹雪芹同样的高度。这些仙逝的名人被人追加了一层“逝者滤镜”,起到了美化形象、拔高地位的作用。

给逝者脸上贴金,古人也很擅长此道。古代有“谀墓”之谓,即写墓志铭时,刻意无视死者的种种过失,对其成就进行过分的夸赞。唐代的韩愈是个中高手,很多名门望族会重金找上门来,求他写一篇墓志铭。他也“从善如流”,大笔一挥,一通猛夸。唐代“谀墓”之风盛行一时,甚至到了“铭勋盛太公,叙德皆仲尼”的地步。也就是说,去墓园子里一瞅,埋的都是可与周公、孔子相比肩的“圣人”。这一方面是文人

【第三只眼】

骈文秀的代价

□王昱

是值得您信赖的,正如您值得我的信赖一样”,甚至“您最卑微的仆从”。写这些句子并非真的为了装孙子,而是为了体现自己谦虚的美德以便达成转文的目的——据说不少国王给他臣下都这么写信,甚至老爹给儿子写信也沿用此套路……看来欧洲兄弟们为了转文也真是舍得下本,虽然效果并不见得好。

与之相比,咱东邻日本就比较上道些,他们发明了一种“季语”放在文章开头,什么“值此樱花纷落之季”、“会此枫叶醉染之时”,在体现自己高大上的同时还兼职抢了气象台天气预报生意,可谓一举两得。无奈由于日本人死板使然,“季语”最后都固化为某些固定格式,成了日语初学者都要上的必修课,转文的功效算是彻底丧失。

在世界各民族转文的征途上,唯一能勉强与中华文明比肩的大约只有法兰西,他们独辟蹊径把文字拼法、变化搞得超复杂,以至于没文化小伙子连情书都不敢写——因为怕出语法错误。按年鉴学派的观点,法国人爱转文,是因为

他们历史上曾出现过欧洲最典型的封建制度。贵族们特意把书面语搞得复杂,目的是让穷人们很难在他们的圈子里混,文字成了一种“语言隔离带”。按这个逻辑,咱中国人之所以能制造出骈文这东西也就好理解了。骈文起于汉末,盛于南朝。那段日子是士族门阀这种中国特色的贵族小日子过得最烧包的年代,国家干部人事任免公然搞“按爹分配”(九品中正官人法),广大士族们靠拼爹就能享受一辈子荣华富贵,吃饱喝足之后,成天净琢磨怎么秀自己与众不同,于是谈玄斗富、服散炼丹、搞裸体行为艺术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在这一堆搞怪中,骈文大约是最成功的:由于它讲究甚多,没个十几年训练绝对写不好,士族们靠它成功达到了让寒门弟子“写不起文章”的目的。

提高写作门槛带来的“副产品”是,作为文体,骈文优美极了。南朝写骈文写得最好的人是庾信,南梁灭亡后这哥们跑到北国避难,自哀身世写了篇《哀江南赋》,今人写百十来字就露馅的骈文他写了四千多字还滴水不漏,处处合辙押韵,文辞极美。然而美则美矣,庾信的思维逻辑恐让今人难以恭维——国都亡了,自己都混得惨成这样了,还琢磨着东拉西扯、引经据典地秀文采,写这么个一般人翻半天字典也不知道他说啥的文字。只能说南朝士族们已经到了“转文成瘾”的地步。

当然,说骈文毫无实用性也不是事实。唐朝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就非常有战斗性,把扯旗子造反说得那么富有正义感也算门本事,连被“讨”的武则天看了文章以后都感叹他是人才。然而,文章到后来估计是写爽了,终于露了馅——什么“凡诸爵赏,同指山河”?原来起兵不是

往往隔着遥远的时空。时空的落差,让人无法全然知晓过去的种种。所以编造的杨绛语录大行其道,反映出民众的盲从。隔着遥远的时空看过去,逝者的身上被打上了一层朦胧的柔光。

美化逝者成为常态,很多是因为其中暗含了一种逻辑,即通过对逝者的赞美来实现对今人的批评,通过对逝者所处时代的褒扬,表达对当下的不满。“现代中国没有大师,大师都走远了。”近些年来,这个说法被反复提及,几乎成为大众心中的定论。人们很少去问,大师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大众对于这个说法欣然接受,只因其暗合了他们的心理预期:今天是不完美的,好在往事仍可回味。所以我们看到,对“民国范儿”的推崇一时成为文化界的时尚。杨绛等人自身的成就暂且不提,他们所处的时代在现代人看来是美好的。曾风靡一时的汪国真,他所处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虽与今天相去不远,但毕竟已经有了时间的跨度,所以也被一并歌颂。

对逝者的品评和追捧,体现着今人的价值观。韩愈在给柳宗元写的墓志铭中就说:“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其实也是对自身际遇的喟叹。可见,逝者与生者的对立,并非简单的死与生的对立,还包含着好与坏、白与黑、理想与现实等等。死亡成为他们最后的加冕,使之

为了勤王而是为了分赃啊!于是道理归到了武则天那一边——转文就难免自嗨,自嗨就难免露馅。这是骆宾王用生命告诉我们的真理。

唐宋以后,骈文就没落了。究其原因,我觉得唐宋八大家掀起的古文运动作用倒在其次。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知识分子的地位直线下降,元代做了臭老九,明清也是说杀就杀。既然文人地位已然不尊贵了,自然失去可供一转的价值。不过,还是有一种文字执着地使用着四六骈文,那就是皇帝的诏书,其实这也好理解,宋代以后,整个中国就剩下皇上一个人最转了,他当然有资格、也有必要转文,但从此骈文就鲜有华章了——有些话,即便被加工得合辙押韵,说得跟花一样,也是独裁者的自白。

明清往后的骈文诏书中,唯一给我留下过深刻印象的是1899年慈禧太后假光绪之名向列国宣战的诏书。文章写得那叫一个气壮山河:“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不翻译成白话,你根本听不出这是一个国家向自己所有邦交国宣战的找死行为。当国际舆论都在用平实的白话、严密的逻辑论证你违反了国际法,并侵害传教士生命财产安全时,你还在用骈体转文自嗨,自我陶醉。这样的国家确实没有理由不败,而这样的文体,也确实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皇上没了,诏书没了,骈文也终于彻底没落了,但时不时仍有人想要拿它秀一下,下场总是不免被喷。这是很好理解的——你不是门阀士族,没受过那个训练,又不是皇上,没有淫威把大家的嘴都堵上,去非要拿这种贵族们的专利文体去秀,被喷那是应该的。这就是转文的代价。

定格为远远矗立的他山之石。

追捧的对象又不仅仅是人,还可以是体制、环境等等。使用这种伎俩的例子古今中外比比皆是。文艺复兴将理想国设定为古希腊和古罗马。启蒙运动时的伏尔泰,将遥远东方的孔子和儒教看做是完美的榜样,尽管他对中国只了解皮毛。而在中国,两千前的老子也将希望寄托于更为遥远的“小国寡民”。他想象中的图景看上去十分美好:“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这种理想国是否存在还得另说,更别提是否真能指导当下了。“这山望着那山高”,“国外的月亮就是圆”,这些常见的行为,其实与当今我们追捧逝者是一脉相承的。

现如今加之于逝者身上的滤镜,不可谓不厚。对于去世的文化名人,今人在他们身上寄托一些思绪,无可厚非,也无伤大雅。但厚古薄今也好,借古讽今也罢,我们毕竟是活在当下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如果一厢情愿主观吹捧,并无好处,而如果再将这些吹捧信以为真,以虚假的过去来指导现在,更是得不偿失。当然,近去世的名人,要想瞬间摆脱种种纷扰,实现盖棺论定,殊为不易。但客观评判才能实现真正的反思,也是对他们的尊重。

【观者有心】

出血的同时 别忘记回血

□韩松落

黄轩和杨幂主演的《亲爱的翻译官》正在播出。算起来,这也是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我们看到的第四部由黄轩主演的大戏了,去年年底的《半月传》,今年年初的《猎人》和《女医·明妃传》,现在的《亲爱的翻译官》,都是高投入、高收视的作品,接下来还将有《海上牧云记》和张艺谋电影《长城》。对黄轩来说,这是一个大年。这些艺术性和商业性俱佳的作品,彻底改变了黄轩给人们留下的文艺小生的印象,让他成为商业性很强的明星。

而我,是在黄轩的文艺小生时代开始喜欢他的。《春风沉醉的夜晚》里,秦昊和陈思成太抢眼,但他的出现却也同样触目。后来他演了《成都我爱你》,这部电影上映时,我没机会看到它,但没想到,后来在KTV里和这部电影遭遇——电影中的画面,被剪成了谭维维《往日时光》的MV,这首歌和歌背后的画面,让我极为好奇,我于是专门找了电影来补课。然后是《蓝色骨头》、《黄金时代》以及《推拿》,所有这些电影里,他都有上乘表现,和同台飙戏的大演员相比,也并不逊色。

好看的演员,往往欠缺演技;有演技的演员,往往不够好看。黄轩却同时占据了两种优势,成为有演技的偶像,满足了这个时代的演技偶像焦虑,他的演艺生涯能够骤然走高,一点也不意外。偏偏这又是个娱乐传媒业大爆发的年代,整个行业求才若渴,他立刻被资本选中,从文艺片领域进入商业片领域,并且同样亮眼。

此时的他,就该接商业大制作,就该证明自己的票房能力,就该春风得意,在他的这个年纪、这个阶段,就该如此这般投入、如此这般快乐。

但商业大制作,对一个演员来说,是抬举,但其实也是榨取,这些作品趁时而悦目,快速地消费演员的声誉、演技、形象、新鲜度,演员出演这些片子,获取了高片酬或者进入资本市场的能量,但同时也在快速地消耗自己,那些收获,都是用另外一些东西换取的,那些东西,一旦去了,就很难再来。对演员来说,这是一种出血。它会让一个演员快速地失去新鲜感,快速地透支演技,快速地成为泡沫,这种例子,实在太多太多。

很多演员很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在出血的同时,努力回血,例如适当地沉寂一段时间,营造神秘感,或者出演文艺片、舞台剧,或者去做公益活动。例如胡歌,在他伤愈之后,就用了一段时间沉淀自己,去出演酬劳不那么高的舞台剧,再度出山的时候,果然一鸣惊人;再如陈坤,在心事繁多的时候,发起了“行走的力量”,去接近荒野,在行走中积蓄力量。好莱坞的很多明星,也时不时去出演文艺片大导演的片子,磨练演技,丰富形象,增加自己形象的厚度,再出现在商业大片里,也不至于白纸一张。只有这样,只有不停地在出血的同时回血,才能让演艺生命尽可能地持久。

人的命数,非常神秘,但也有技术性的一面,就像股票一样,有许多可以分析预测的地方,在一路疯涨的时候,适度让自己回调,是为了更好地迎接下一波上涨,在所有人都看好的时候,适度冷却,会夯实上涨的基础。

也希望黄轩能够在出血的同时努力回血,用文艺片、用舞台剧,或者适度的沉寂,永远血槽满满,被期待,被铭记。

【见仁见智】

逝者滤镜从何而来

□魏新丽

之间的面子功夫作祟。在人家的葬礼上说不好听的不合适,美言几句场面话,成人之美,你好我好大家好。现在圈内人对逝者的追捧,恐怕也有类似的意思。另一方面,我们得承认,死亡是有加成的。死者为大,人们容易对生者苛刻,对死者宽容。所以有人说,大师没死的时候,大家都不会把他当大师。死亡是滤镜的一部分,它遮掩了逝者身上的瑕疵,凸显了其成就,并将之推上高位。再者,距离产生美,距离有时间上的,也有空间上的。今人与年长的逝者之间,